

关于土肥原机关长的主要活动，大致如上所述。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以下附加说明。

### 事变前夕的天津机关长

1930年4月以来，中央政府首领蒋介石与西北派的冯玉祥、阎锡山对抗，一直处于交战状态。张学良乘虚而入，以劝告停战、和平调解为名，于9月中旬率7万奉军进关，后来张学良在北平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

进入1931年后，奉军为了压制逐渐抬头的反张运动，进一步增强了进关的兵力，至事变爆发前夕，已达到十一万五千多人。就在这时，1931年3月，土肥原领导的特务机关宣告诞生。

（摘自《土肥原秘录》）

## 天津便衣队暴乱事件亲历记

刘家骥

1931年，东北军第二军军长王树常兼任河北省主席，驻天津，我担任第二军参谋长。这年10月下旬，王树常从北平开会回来，召集所属军警负责人开会。王说：“日本人占了东北，还想向关内推进，他们现在采取以中国人打倒中国人的办法，利用一些流氓、地痞在各地进行骚扰破坏活动。我这次在北平听说，日本人在天津准备组织便衣队起事，自今日起我们要加紧戒备。”当时我们在天津可以使用的兵力，主要是公安局保安大队，虽然不是正规军队，但枪械齐备，训练有素。总队长是王一民。由于《辛丑条约》的关系，天津市内的驻兵受到限制，第

二军只有第十五旅的一个营驻在市内，其余大部分驻在塘沽、军粮城一带。此外还有第五十三军第三十旅的康团驻在杨柳青，有事时可以调用。大家听了王树常的报告以后，立即开始进行戒备。

11月8日的傍晚，那天正是星期天，我在一个亲戚家闲谈，公安局保安大队总队长王一民突然打来电话找我，说有要事需面谈，我当即到公安局去。与王一民会面后，他对我说：“今天晚上10点钟，便衣队要起事。”我说：“确吗？”他说：“怎么不确，我们派的人打人他们里边，一切都摸底。带头的是张璧、李际春，今天把枪和符号都发了，说得清清楚楚，在今晚10点钟出动。”我说：“那你赶快准备，我去报告军长。”说罢，我就赶到意租界王树常家里。王先问情报是否准确，接着又说：“不管确与不确，你先回司令部，我待会儿也去。你回去立即把各处处长找来，对他们说明情况，今晚宣布戒严，把铁桥拉开（指金钢桥）。”我回到司令部，就按照王树常的指示进行了部署。还把第十五旅旅长姚东藩找来，要他准备车辆把部队运到天津市市区边界来，同时通知第三十旅康团也开到市区附近待命。

部署完毕，王树常来到了司令部。这时王一民来报告：“保安队已布置好了，从东南城角到西南城角，都已严密戒备，由东区署长任长春负责，注意敌人情况，随时用电话联系。”

我一直与任长春保持电话联系，直到10时许，仍未见有任何动静。我对王树常说：“可能由于我们有了戒备，把事情压下去了。”话音未落，就听见枪声响了。接着任长春的电话也来了，报告便衣队已经出动。

便衣队动手后，我们的保安队立即予以迎头痛击。作战的情况，王一民随时打来电话向我报告。他说：“他们分四路往上冲，来势很凶猛，可是咱们还能顶得住。”过了半个钟头，王—

民来电话说：“敌人攻得很紧，得增加人。”我立刻命令驻在蔡家花园的姚东藩旅的一连人在东门外天后宫附近参加作战（部队都换上保安队的制服）。这一连人上去以后，才把敌人的进攻顶住。

便衣队是从日租界里冲出来的。中国地区的电话局、电报局都离日租界不远，敌人似乎企图首先占领这些通讯机关。因为我军的坚守，敌人冲不过来，我们的通讯联络得以保持。

自从便衣队的枪声一响，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翻译吉田就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他装作茫然不解的态度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打起来啦，”我心想，便衣队是从你们日租界冲出来的，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可是我当时不便揭穿事实真相。不久，吉田又在电话中说：“我们司令官非常着急，在乡军人有很多负伤了，你们得赶快停止射击，不然的话，事态扩大了，后果要由你们承担。”我回答说：“那可没有办法，既然那边开枪，我们为了自卫，怎能停止呢！”

又过了一会儿，吉田打电话来质问：“怎么从海河也往上打枪呀！”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接到王一民的报告说：“日本人正在集中火力向水上警察局射击。”我这才明白，日本准备攻击水上警察局，就恶人先告状，反诬我们从水上往岸上开枪，企图推卸责任。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紧张战斗，我军在前线顶住了便衣队的攻势，我也就沉住气了。这时吉田又来电话问：“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撤呀？”我说：“天亮以后再说。”拂晓以后，敌人停止了攻击，我们也就不再放枪了，但仍在严密地警戒着。

在这一夜的战斗中，保安队不断地把抓到的便衣队分子押送到司令部来，前后有一二百人。保安队还砍杀了几名便衣队，把人头挂在东马路街头示众。

9日天明以后，吉田又打电话来，要求中日双方进行一次商谈，以“防止今后别再发生误会”，并建议会谈地点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我向王树常请示以后，同意由我出面与日方会晤。王树常叫我带上两名秘书（陈曙升、陈东升，都是留日学生）、1名副官（王鸿儒），按事前约定的时间下午4时，到达国民饭店。我把副官留在外边，带着两名秘书进入日本人准备好的会场。这时吉田已在场，代表日方的是中佐参谋和知。会谈结果，双方都希望能先做到临时停火，维持现状，在中间地带双方都不许通过，如果抓到对方的武装人员，就要追究责任。会谈的气氛很平和，仿佛昨天晚上双方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冲突似的。谈到最后，吉田又提出此次会谈是否向新闻界发布消息的问题，我说：“如果你们不发表，我们也可以不发表。”最后双方一致同意不向新闻界发布。会谈就此告一段落，时间已近傍晚了。

在归途中，副官王鸿儒对我说，在我们会谈时，各国驻津领事馆都派人到国民饭店了解情况，表现出对这次事件的关注。

我回到司令部，立即去见王树常，把交涉的情况一一向他汇报。王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最后说：“会虽然这样开了，但咱们还要继续戒备，日本人诡计多端，不讲什么信义，也很可能是缓兵之计。反正他不打，咱们决不打他，最要紧的是得把电报局、电话局好好守住。”

我汇报完毕回去休息了一会儿，王树常又派人把我找去。他说：“今天公安局陆陆续续送来了不少人，其中有个厉大森，是帮会里有名的人物，过去在褚玉璞当直隶督办时期当过军警督察处长，岁数也不小了，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地位，你看怎么处理才好？”我说：“便衣队都是中国人，杀也杀不尽，最好让八里台派出所的白凯所长负责办理收容，自首者无罪，缴枪的还可以奖励一点钱。厉大森既然是帮会头子，把他放了，可以让

他出去号召帮会里的人前来自首，我觉得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王树常听我说了以后，同意这样办。

接着，就吩咐左右，把厉大森带上来。厉大森带来以后，浑身发抖，一见王树常便跪倒在地，口口声声地申辩自己不是便衣队，王树常不容他说完，就对他说：“你是不是便衣队我不管，但问你是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不应该往这里头掺和。颠覆政府，危害治安，你自己也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吧！政府念在你们都是一群愚民，受人利用，政府也不忍不教而诛。现在八里台派出所设了收容所，可以到那里自首去。既往不咎，缴枪的还要奖赏。我放你回去，你找个保吧。”厉大森当时千恩万谢，又向王树常磕了一个头，就被带出去了。

还有一个姓马的，过去在直鲁联军当过团长，王树常也把他叫上来亲自审问。马某和厉大森不同，在公安局带上了手铐脚镣全副刑具。他也是不承认自己是便衣队，王树常不听他的辩解，对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便衣队，我可以放你出去，你以后若是乐意干，还可以再干。你看看，这么干能成事吗？一夜工夫，死了多少人，不都是中国人吗？有一个日本人没有？中国人为什么让日本人当枪使？你找保出去吧！”

结果，马某交保释放，厉大森找不着铺保，是由国民饭店经理也是帮会头子潘子欣负责保出去的。厉大森出去一号召，帮会里的人纷纷到八里台派出所缴枪自首，这对于日本人利用便衣队的阴谋，的确起到了不小的瓦解作用。

一连十几天，便衣队一再蠢动，大小冲突不断，中日双方都连续发表声明、照会，互相指责，同时双方官员进行接触，商谈停止冲突办法。到了26日晚间，便衣队又发动进攻，同时日军也参与战斗，开炮轰击省市机关。当时我在司令部里，突然连续地落下几颗炮弹，有的爆炸，也有的没有爆炸，没有发生

什么太大的损害。在这次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达成了中止敌对行为的协议，保安队撤出天津市，市区秩序由警察负责维持。至此，日本指使的便衣队暴乱，历时二十多天，终于平息下来。

这次事件过后，我从陆锦和张拱宸那里打听到有关日本人纠集便衣队的一些情况。陆是我的姑丈，曾任北洋政府参谋次长和陆军总长等职，曾留学日本，与酒井隆、土肥原贤二、和知鹰次等日本军人常有来往。张是我的父执，曾在北洋政府时期任京师军警督察处处长，好交际，张璧、齐燮元、潘毓桂等亲日派经常是他家的座上客。据他们谈称，日本这次在天津发动便衣队暴乱，是因为他们以武力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同时国内有些元老派人物也不大赞同少壮派军人的所作所为，故而改变策略，利用中国人从内部进行骚乱活动，以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便衣队的头目是张璧和李际春，日本人对他们封官许愿，如便衣队成事之后，即由张璧当天津市市长，李际春当保安队总队长。参加便衣队的都是一些失意军人、地痞流氓、帮会分子，以及吸食毒品者，都是花钱雇来的乌合之众，因此不堪一击。同时更由于王一民派内线打入便衣队，及时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计划，事前做了周密的戒备，便衣队出动后予以迎头痛击，终于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摘自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天津便衣队暴乱》，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